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127-138.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11>



东亚视域下的宁波海丝文化

李广志 (Li Guangzhi)

摘要: 宁波海丝文化对外传播的时间久、范围广、影响大，在东亚史上独占鳌头。由宁波传到海外的文化既包含物质方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同时也伴随大批人员交流互动。宁波成为通往日本和新罗海道的启碇港，将中国先进文化、制度、汉字及书籍等传播到海外。文章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线索，考证了宁波与东亚千年海上交通的历史，梳理东亚文明史上留下的文化印记。

关键词: 遣唐使；市舶司；高丽使馆；大唐街；圣地宁波

作者简介: 李广志，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电子邮箱：liguangzhi@nbu.edu.cn。

Titl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e of Ningbo from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e of Ningbo has a long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with extensive reach and profound influence, ranking foremost in East Asian history. The culture that spread abroad from Ningbo encompassed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accompanied by large-scal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rt for routes to Japan and Silla, Ningbo served as a gateway through which advanced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ions, Chinese characters, and books were transmitted overseas. Taki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s its central threa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llennium-long maritime history between Ningbo and East Asia and traces the cultural imprints left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Envoys to Tang Dynasty; Office of Oversea Trade(Shibosi); Goryeo Embassy; Datang Street; Sacred Ningbo

Author Biography: Li Guangzh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specializing in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E-mail: liguangzhi@nbu.edu.cn.

宁波被称为古丝绸之路的“活化石”^①。宁波地区不仅有丰富的史前文化，河海元素独具特色，唐代开始设明州，由此展开对外交流，积累了丰富的丝路文化。宁波海丝文化对外传播的时间久、范围广、影响大，在东亚史上独占鳌头。宋代以后，宁波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在宁波与日本、高丽、东南亚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交流两千年，早期是以官方往来为主，日本使者多以到访国都为最终目的地。中国古代都城经常更迭，比如，自秦汉以来，今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地，都曾经做过不同时期的首都，日本奉贡朝贺的地点也随之不断变换。但是，宁波与日本的交往，1300多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从区域角度来看，其历史之久，内容之丰富，超过历史上的都城，是我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通过宁波输往日本的瓷器、书籍、艺术、习俗、文学等，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宁波在的地位，近年被日本学界称之为“圣地宁波”。如今，宁波城内保留许多海丝文化的历史遗存。这些看得到、摸得着的景观，连接宁波与东亚的海洋世界，展示着宁波这座城市的丰富文化内涵。

一、宁波与日本的海上交通

唐代的明州，成为通往日本和新罗海丝之路的启碇港。日本及新罗的船只可利用季风及洋流，横渡东海、黄海直达明州。日本遣唐使带回大唐的先进文化、制度、佛教及书籍等，明州与遣唐使之间留下许多历史佳话。

鉴真东渡在中日交流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影响不局限于当时，一直延伸至今。自742年至753年，鉴真进行了长达12年的东渡之旅，前五次均遭失败，第六次才得以成功。他凭着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实现了赴日弘法的心愿，同时也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

743年底，鉴真第二次东渡遭遇暴风失败，在明州上岸，被安置到阿育王寺。鉴真在明州居住期间，遍游阿育王山，见到了鄮山东南岭石上的佛足迹、圣井等遗迹。鉴真与明州阿育王寺的因缘，成为日本佛舍利信仰的源头。鉴真东渡所带物品的清单中有“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及“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真人元开、汪向荣 87-88）如今，日本唐招提寺内，盛装舍利的“金龟舍利塔”和鉴真带来的“白玻璃舍利壶”，以及包裹其壶的“方圆彩系花网”都已成为日本国宝级文物。自鉴真以后，日本佛舍利信仰发生了变化，成为人们礼拜的对象。不能不说，鉴真带到日本的阿育王信仰，也使宁波与日本佛教开始产生了机缘，为日本佛教注入了新的成分。

阿倍仲麻吕是唐代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也是日本留学生的杰出代表。唐开元五年（717），不满20岁的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入唐，求学长安，改名为朝衡（亦作晁衡），后历任司经句校书、左拾遗、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职，直至大历五年（770）逝世，在大唐生活了54个春秋。他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交往密切，以文会友，尤其在明州海边咏唱的《明州望月》诗，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李广志 1-12）。

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年，唐贞元二十年），日本再派遣唐使。这批遣唐使中有两个重量级人

物，即最澄和空海。他们二人在唐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日本所传播的思想，影响日本一千多年，至今仍是日本文化中的代表人物。其中，最澄抵唐和返回日本的线路都是从宁波进出的，他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明州、台州和越州等地。

延历二十三年七月六日，四艘遣唐使船从肥前国松浦郡田浦同时起航。次日，第三、第四船失去联络，第一、第二船驶向大陆。其中，空海乘第一船，最澄乘第二船。八月十日，空海乘坐的第一船漂至福州长溪县赤岸镇己南海口。最澄所乘的第二船，较顺利地抵达明州。第二船人员中，判官菅原清公等二十七人准许入京，九月一日从明州奔往长安（李广志 362）。

最澄因欲往天台山巡礼求法，在明州稍做休息后，于九月十五日出发。日本延历寺保存下了当时明州和台州官府给最澄出具的牒，作为唐代发给外国人的通关文书，在唐日关系史中堪称一级史料，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现在已列入日本国宝。此牒称作《明州牒》，也称《传教大师入唐牒》，现存原本是两份牒，合二为一，前一部分是明州史孙阶签发的牒文，后一部分为台州刺史陆淳给最澄回明州时签发的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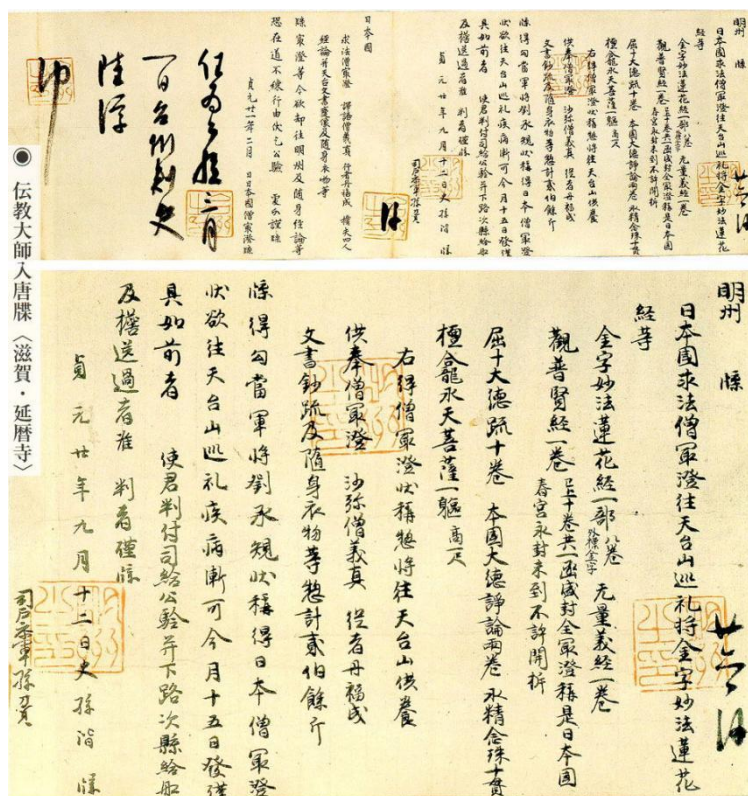


图 1: 《明州牒》(日本滋贺县延历寺藏, 笔者摄)

Fig 1. “Mingzhou Tie” (collected by Yanli Temple in Shiga Prefecture, Japan,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明州史孙阶签发的日期为九月十二日，另从最澄“疾病渐可”可以看出，最澄到达明州已有一段时间。如此，最澄开始了在唐为期八个多月的求法巡礼活动。

第二年，最澄自台州返回明州后，又到越州龙兴寺求法，在越府峰山顶道场得阿闍梨沙门顺晓灌顶传授三部三昧耶、图样契印法，接受密宗“两部灌顶”后再回明州。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五月五日，最澄受教于明州 县檀那行者江秘，从他那里受得“普集坛”及“如意轮坛”。最澄在其著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载有“大唐明州檀那行者江秘”，其文

曰：“大唐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大唐国明州檀那行者江秘。留传此普集坛并如意轮坛等。往日本国讫。付法行者。大唐明州 县廊里江第十二郎。”另，最澄还记录了在开元寺的活动情况，题为“大唐开元寺灵光和上”，该项载：“大唐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五日。明州开元寺西厢法华院灵光和上。传授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像等。”（李广志 139-152）可见，最澄与明州开元寺有着不懈之缘。

遣唐使在明州期间，地方政府负责他们的吃住行，向他们提供食物，安排住处，一切费用由唐政府承担。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六日，朝廷还下诏赐给在明州留守人员每人 5 匹绢。寺庙则是安置遣唐使的主要场所，《日本后纪》载：“从去二月五日发福州，海行五十六日，此日到来。三日，到明州郭下，于寺里安置。”（森田悌 363）从福州过来的第一船等待人员，几乎全部安置在明州的寺院里。当时明州城及周边寺院有近二十所，其中包括城里的开元寺、开明庵、太平兴国寺和郊外的阿育王寺及天童寺等。

遣唐使回国前，明州刺史郑审则还送给最澄一封信，称赞最澄不畏艰险，万里求法，“可谓法门龙象，青莲出池。”（叡山学院 281）由此，遣唐僧最澄结束了浙东求法之路，携带大量的经书章疏及图像和法器，满载而归，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

另一位文化大师空海，在长安留学期间师从青龙寺惠果和尚，禀学真言密教。他很快便融会贯通，接受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大法灌顶。因其学业优异，提前回国。唐元和元年（806）四月，空海前往明州途中，在越州与当地文人进行了广泛交流。据说，空海回国前，为在日本寻求传授佛教的圣地，在明州海边投掷密教法器“三钴杵”。他面朝日本方向，高声祈愿：“吾国如有圣地，愿三钴降到彼处，归国后必竭力传播！”（李广志 76-80），于是抛向空中。三钴杵乘五色彩云，放射吉祥光芒，飞向东方大海。

回国后，空海在高野山金刚峰的一棵松树上找到了这个三钴杵，因此，高野山也就成了真言密教的道场。高野山上至今存活一棵“三钴之松”，据说就是当时空海投掷三钴杵时落到的那棵树。可以说，在日本密教缘起中，贯穿着一条宁波与高野山之间的飞天之路。

二、东亚海丝的启碇港

9 世纪开始，东亚海域交流发生重大变化，以唐朝商人、新罗商人、渤海商人和日本商人为主的海上贸易商团开始崛起，他们活跃于唐、日本和新罗等地，成为东亚海域交流的主体。在明州口岸，聚集大批海商，他们承载着货物运输与人员移动的跨国交往。

9 世纪上半期，新罗海商张宝皋掌控大部分东亚海域，从事唐与新罗、日本之间的贸易。张宝皋的贸易，以新罗清海镇为大本营，范围延伸至山东赤山、登州、莱州、泗水、楚州、扬州、明州、泉州及日本九州等地。

明州与新罗及日本的跨国贸易，贯穿整个 9 世纪。唐元和年间（806 年-820 年），浙东与新罗间就已畅通了航线。元和十一年（816 年），《旧唐书·东夷·新罗》载：“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六人求食于浙东”（刘昫等 3632），当地政府妥善安置。另外，日本弘仁十年（819 年）六月，就有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人，乘新罗船抵日的记录。第二年，周光翰、言升则等人乘渤海使船回国。明州与新罗间的海上交通，随着洋流以及季节风的变换，形成一条自然畅的通道，致使两地船只，即便不欲互市，也会偶尔吹到对方。日本最后一次抵唐的遣唐使回国时，便担心飘至新罗，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载：“案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为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

船，又着新罗。”（圆仁 36）可见，在圆仁记录的开成四年（839），以及较早时期，明州与新罗之间，时常会发生船舶漂着现象。

另据 1936 年《牟平县志》录《无染院碑记》载：“又鸡林金清押衙，家别扶桑，身来青社，货游鄞水，心向金田，舍青鳧择郢匠之工，凿白石竖竺乾之塔。……施主浙江东道东西都指挥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守明州刺史兼御使大夫黄晟。”（中国方志丛书 1449-1452）碑记中的“鸡林”，指新罗，“金清”，则为新罗国押衙。唐时，藩镇史府、都督府内掌管衙内之事的官员，或负责仪仗的侍卫称“押衙”。“扶桑”，则指东夷诸国，此处为新罗。“青社”，原指以青州为中心的山东地区，此处指登州昆崙山一带。“鄞水”，明州地区，因古置鄞县，流淌鄞江，故此处称之鄞水。“金田”，指佛寺。黄晟（859 年-909 年）则是明州鄞县人，性格强悍，唐末乱世而起，独霸一方，自任明州刺史，在任 18 年，政绩斐然，深得后世明州人民的怀念。

唐末海商中，李延孝、张支信（有些史料记为张友信）、詹景全，航行的次数最多。唐朝商人及船主的身份，文献有记载的包括：明州商人张支（友）信；大唐商人李延孝，又称渤海国商主；越州商人詹景全，《延历寺座主圆珍传》则称其为婺州人；唐人李邻德；新罗国人王超；新罗人张公靖；此外，还有浙江商人李达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 9 世纪东亚海域交流中，商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跨国性，超越了现代人所界定的国界和民族的概念。有的唐船或唐商人，实际又为新罗船或新罗人。圆仁归国时所乘船员有唐人长江、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此船在日本则称“新罗商船”，新罗人金珍又被称为“唐人”和“唐客”。同样，钦良晖又被成为“唐商”和“大唐国商人”，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宋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称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职能。就其等级而言，分为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路一级设市舶司，其下属市舶务多在州，下级政区设置市舶场。北宋末设有五处市舶司，分别为：广南路广州、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杭州和明州、京东路密州市舶司。

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三月二日，两浙提举市舶移至秀州华亭县置司。此后，杭州、明州两处市舶司改为两浙路市舶司下辖的市舶务。两浙路市舶司下辖五个市舶务：杭州市舶务（后为临安府市舶务）、明州市舶务（后为庆元府市舶务）、秀州市舶务、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年起杭州的市舶务被停废，宋宁宗执政期间（1195-1224 年），曾一度只许宁波从事中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外贸易。

宋代与高丽交通的主要口岸有两个：第一，北路，山东半岛的登州；第二，南路，即明州口岸。北宋熙宁七年（1074 年），高丽为躲避契丹的威胁，请求由明州上岸，宁波开始接待高丽使者。元丰元年（1078），定海县建“航济亭”，确立“为丽使往还赐燕之地”（《宝庆四明志》卷十八《定海县志》）。如今位于宁波市月湖北侧的“高丽使馆遗址”，是宁波港与高丽往来的历史见证。所谓高丽使馆，历史名称为“高丽司”、“来远局”、“高丽使行馆”、“高丽行衙”，政和七年（1117 年），明州人楼异建议宋徽宗在城内建造，徽宗皇帝愉快地答应，并有御笔批谕。这一馆舍不仅是接待高丽使者的设施，同时也是商贾及朝贡贸易的中转地，在外交礼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宣和五年（1123），宋朝以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为正、副国信使出使高丽，擅长书法的徐兢，以奉议郎充奉使高丽所提辖人船礼物官的身份随同行。徐兢一行于宣和五年三月十四日，乘舟出汴京（今开封市），五月三日抵达明州，行程 49 天。在明州休息几日后，开始出发，通过海上航路驶向朝鲜半岛的高丽国。

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载，宣和五年五月“十六日戊辰神舟发明州，十九日辛未达定海县”，二神舟及六客舟，8 船浩浩荡荡地离开明州定海县，“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鸣金鼓，张旗帜，以次解发。”此次使团在高丽逗留约一个月左右时间，回国后，徐兢将所见所谓如实地记录下来。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研究宁波与朝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珍贵史料，他详细地记载了自明州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海上航线，是我们了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

南宋初，高丽行使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高丽向金国称臣，高丽使改向金派使者，高丽行使馆的作用随之减弱。隆兴二年（1164）四月，高丽入贡，此次是明州接待高丽官方使者的最后记录，此后遂绝。



图 2：旅日华侨捐资修路的宋代石碑（宁波博物馆藏，笔者摄）

Fig 2. A stone tablet from the Song Dynasty, donated by overseas Chinese residing in Japan for road construction (collected by Ningbo Museum,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1980 年代初，一个新的发现，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宁波天一阁内尊经阁西边的院墙上，嵌入三块宋代华人刻石，他们是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名居住在日本太宰府（又作大宰府）博多港的华人捐钱给明州寺院的刻石，施主的姓名分别为丁渊、张宁和张公意。丁渊捐资“十贯文，砌路一丈”；张宁“舍身砌路一丈”；张公意“舍钱十贯，明州礼拜路一丈”。这三块石刻文物遗存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宋代华人在日本侨居的状况。

如此，在 11 世纪左右，博多地区形成了中国人居住区。尽管各类史料表述略有差异，但多数都称之为“唐坊”、“唐房”或“唐防”。滋贺县西教寺所藏《两卷疏知礼记》（上）永久四年（1116）五月十一日条载：“筑前国薄（博）多津唐房大山船龚三郎船头房，以有智山明光房唐本移书毕。已上。”（奈良国立博物馆 292-293）据此可知，在博多地区已有中国人居住的“唐房”，“大山”为大山寺（有智山寺），“龚三郎”应当是中国人名，“船头”是指船长或船主。关于“唐坊（房）”

一语，“唐”指唐人，即中国人，“坊”指他们居住的街巷或房屋。唐宋时期广州出现的阿拉伯、穆斯林聚居区称作“蕃坊”；唐代居住在楚州的新罗人生活区称“新罗坊”。

明代李言恭、郝杰著《日本考》载，在昔日日本博多有一条街，名“大唐街”。可见，博多中国人聚居区，形成于 11 世纪，一直持续到 12 世纪中下叶。尽管这种华人聚集海外的现象，并非日本独有，类似于博多唐坊的中国人居住区，同一时期也出现在高丽及东南亚各地，但宋时在博多地区形成的唐坊，无论在文献、考古资料还是历史遗存等方面，是已知华人在海外生活过程中最为完整的大唐街，可以称作是世界上最早的“唐人街”。

三、日本佛教的源流“圣地宁波”

在日本美术史上，有一个专用的学术名词，称作“宁波佛画”。这一术语的代表作基本上出自宋元时期宁波地区的美术作品。可以说，宁波是日本佛教的源头之一。其中，位于宁波市的天童寺与阿育王寺，他们不仅在中国佛教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日本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2009 年 7 月 18 日—8 月 30 日，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举行一个特别展，题目叫：“圣地宁波——日本佛教 1300 年的源流”。此展览一出，立刻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圣地，指的是佛教发源地或与之有关的神圣之地，说明日本佛教与宁波有着密切关系。

荣西是日本临济宗祖师。他曾两次入宋，他的入宋求法之路，在宁波与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留下一条鲜明的文化交流轨迹。

第一次是 1168 年（日本仁安三年），四月三日出生，四月二十四日到达宁波。期间，到阿育王寺朝礼舍利、巡礼天台山五百罗汉，停留 4 个月后回国。

第二次是在 1187—1191 年。在宋生活 5 年，期间，初于天台山万年寺师事虚庵怀敞禅师修学禅法，并随其来到天童寺学习。虚庵见天童寺的千佛阁，破损严重，发愿重修。荣西得知后，为报师恩，欣然许愿，提出回日本后愿寄来良材，以助修复千佛阁一臂之力。

绍熙二年（1191）秋七月，荣西乘杨三纲船离开明州。回国后，荣西果然从日本运来大批木材，以援助修建损害的“千佛阁”。楼钥《千佛阁记》载：“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辇致山中。”（天童寺志编纂委员会 104）可见当时的壮观场面。

如今，千佛阁已不复存在。但是，天童禅寺在内外二“万工池”中间的位置修建一个千佛阁遗址，称“千佛亭”，再现当初的历史时空。位于天童禅寺东南青龙岗山坡上新建一个“千佛塔”，与千佛阁遗址遥相呼应，采用七层八面楼阁式宋塔的样式。塔下文字牌介绍：“古有千光荣西为报佛恩，携僧众 59 人从日本送‘百围巨木’建‘千佛阁’，万历十五年（1587），毁于水灾。现建 59 米（地面 54 米，地宫 5 米）高的千佛塔以纪念千光荣西一行礼佛盛事。”曾经的千佛阁虽已消失，但千佛亭遗址叙说着千年的历史，令游人叹为观止。

荣西是将流行于南宋时期禅宗传到日本的先驱。同时，他写有《吃茶养生记》，被日本称为“茶祖”，日本茶叶第一人。据说，荣西从明州回国时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后，日本才开始有了茶叶。

今宁波市三江口岸矗立一座纪念碑，上书“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1223 年阴历 4 月，24 岁的道元远渡重洋来到南宋的宁波（庆元府）。初到宁波时，因手续不全，未能立即上岸，在船上生活了一段时间。

五月四日，道元正在船上和日本船长聊天，一位老僧上船来，欲购买日本产的香菇。道元一边

劝茶，一边询问，得知老僧为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的典座。于是，二人促膝长谈，度过一段暂短的美好时光。这一段经历，不仅令道元本人终身难忘，同时也给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道元在《典座教训》中记下了当时的精彩瞬间。典座，相当于禅寺里的厨师长。



图3 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笔者摄）

Fig 3. Monument to the Arrival of Dogen Zan in Song Dynasty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二人交谈完了后，同年七月，老僧辞去典座一职，准备还乡，得知道元在天童山挂锡，特意去看他。二人再度相逢，道元高兴不已，赶紧请教日前在船上留下的文字和修行的问题。典座又给道元指点一番，为道元开启了新世界。典座所言“遍界不曾藏”，指的是大千世界无任何隐瞒，现实世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起初，在道元看来，典座一职，只是做些杂务，受苦受累，对于追求修行悟道没什么好处。修行佛道应该坐禅、读经、参话头，而烧火做饭之类的日常炊事劳动与佛道无关。然而，典座开启道元，任何事情，都含有禅的精神，炊事也有禅，炊事禅。文字也不可执迷于文字的表象，文字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融会贯通，达到真正的目的。由此，道元最后表白：“山僧聊知文字，了辨道，乃彼典座之大恩也。”^②

雪舟是明代（日本室町时代）的著名画僧，日本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画家。1467年，雪舟随遣明使船来中国，从宁波上岸。在宁波期间，雪舟游览了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尤其在天童寺，他获得了“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称号是个荣誉称号，不是实际职务。天童寺授予他第一座，也就是“太白山天童景德禅寺”的首座，这也许是因为他是外国僧人，自古以来，对外国友人一般都给与特别的关照。雪舟来明朝前，他的僧位是“知客”，也就是寺院中负责接待客人的僧职，官位并不高。获得“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对于雪舟来说，是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也以此为自豪，在晚年的书画中，经常以此为落款。可见，天童寺已深入到日本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成为日本文人及僧侣向往的地方。

阿育王寺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自从鉴真东渡以后，阿育王寺及其佛舍利信仰，在日本逐渐广为人知。

作为日本国分总寺的东大寺，12世纪末曾一度毁于战火，在重建过程中，负责人重源聘用宋朝工匠，最终完好地修复了东大寺。重源曾“入唐三度”，1167年，他首次入宋时，1168年在明州遇

见荣西，二人一起参礼了天台山、阿育王寺。重源见阿育王寺的舍利殿严重破损，表示愿意修缮积德，回国后运来了日本良材，阿育王寺以此木材修复了舍利殿。重源启用宋人陈和卿为指挥，铸佛造像，1183年（寿永2年）冶炼铸造成大佛之首。1196年，明州工匠伊行末等四人雕造了石像、石狮等，最终才使重建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总之，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中日交往史的长河中，宁波天童寺与阿育王寺始终是两座高峰，尤其在中日两国佛教交流、文化互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以鉴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使者，还是以荣西、道元、雪舟为代表的日本求法僧，他们的足迹映射在两座古刹的历史步道上。

四、宁波与日本的跨海交流文化遗产

在一千多年的中日交流中，宁波作为文化的输出和输入地，展示了港航文明的重要价值。宁波自身的文化元素，通过贸易、商人及僧侣等带到日本，丰富了日本的佛教、艺术、文学和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内涵。

日本现存许多南宋时期的石刻艺术。东大寺南大门的两座石狮子，为赴日的明州石匠所雕刻，据《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记载：“建久七年（1196），中门石狮、堂内石胁士、同四天像，宋人字六郎等四人造之。若日本国石难造，遣价直于大唐，所买来也。”（佛书刊行会 54）据此可知，1196年，来自宋朝的六郎等四人，建造了东大寺南大门两侧的石狮、佛堂内的石造胁侍菩萨和四天王像。日本自身的石材难以刻石，所以从中国买来。刻造的石材，证实为宁波产的梅园石。此处的“六郎”，是排行的称呼，并非真名。而这四人中，能够证实其真实姓名的也只有这位“六郎”，即明州工匠伊行末。



图4：东大寺南大门石狮（笔者摄）

Fig 4. Stone lions at the south gate of Todaiji Temple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伊行末的活动痕迹多见于日本历史遗存，奈良县宇陀市大藏寺层塔，造于1240（延应2年），十三重石塔，四面重檐无纹饰。塔上铭文刻有“大唐铭州伊行末”等字，这里的“铭州”即是“明州”。也就是说，伊行末是宁波人。东大寺法华堂（三月堂）门前，安置一件由伊行末权守施与的石灯笼，灯笼上铭文显示为1254年（建长6年）。在东大寺重建过程中，伊行末修筑大佛殿石坛、四面回廊等，功劳卓著，特授予其“权守”（官位）一职，为此，伊行末布施石灯笼一座。

伊行末为修建东大寺而来到日本。1196年，伊行末等四人建造的东大寺南大门石狮子，分东、西方雌雄两座，矗立于南大门北侧，面北背南，入口处各一尊。其中，东方像高1.80米，西方像高1.60米，分别被安置在高约1.40米的华丽底座上。两座雕像的实际高度均已超过3米。两具座狮（蹲狮），胸佩腰带和流苏。底座四周雕有含苞欲放的牡丹、开花莲、飞天及双狮戏球等图案。并且，其上下配有莲瓣，下端刻有隅撑的脚台，底座基台雕有复杂的云纹图样，足见工匠的技艺精湛。

伊行末完成东大寺援建后，携家眷在日本定居下来。行末逝后，后人继承其石刻风格，光大他的事业，活跃在镰仓南都一带，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伊氏石刻流派，成为日本石刻工艺史上赫赫有名的“伊派”，同时也是另一石工名流“大藏派”的鼻祖。这使得“伊派”石刻艺术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江户时代诞生了阳明学，王阳明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遣明使来华时期。正德八年（1513）五月，王阳明与日本遣明正使了庵桂悟在宁波会晤，王阳明撰并书之《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落款时间为“皇明正德八年癸酉五月既望”，即公元1513年，明正德八年五月十六日。此序比宁波文人张迪（自称“四明山人习斋居士”）为《了庵和尚语录》作跋文早一日。阳明是与弟子徐爱等人游浙东诸名山后，途经宁波返回余姚时，遇见了日本遣明使正使了庵桂悟，并为其送别诗文作序。

了庵桂悟本为僧人，因其拥有丰富的学识和人格魅力，81岁高龄被任命为正使。此次遣明使于正德六年（1511）六月抵达宁波，正德八年回国。由于使团分两批出发，四船之中，第四船的正使为宁波出身的宋素卿，他早于其他三船提前抵达宁波，并且先行返回。了庵使团朝贡仅至南京，未能到北都，阳明与了庵之会晤，亦仅此正德八年五月一次。

了庵桂悟回国前，宁波文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会。宴会上所作之诗、所撰之文，均有记录，经人整理汇集成册，然后请宴会上最具文采的人作序。此刻，正是王守仁（王阳明）所作写《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诞生的过程。

该序文极其珍贵，未见中国史料记载，最早见于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斋藤拙堂的《拙堂文话》中，后被《本朝高僧传》《邻交征书》《大日本史料》等收录，但文字略有出入。通过阳明参加送宴会及作序之举，可以认为，这是王阳明亲自参加的一次中日文人交流实践活动，也是部分阳明思想直接传到日本的首次历程，尽管尚不清楚它对后来日本形成的“阳明学”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它至少在历史学、文学及书法等方面是一份宝贵遗产。

阳明序的原本在日本久为私家秘藏，长期下落不明。直到东京五岛美术馆举办新装开馆纪念名品展——“五岛美术馆·大东急纪念文库之精华”，王阳明《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手书真迹才得以面世。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宁波与海外的交往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通览全史，交往的区域以东亚为主。唐

代中日交往分为两个时期，前半部分为官方往来，唐中后期以民间贸易为主。宋元时期则主要是民间贸易，虽说民间贸易，但也是在国家管理之下进行的商品交易及人员往来。明代为勘合形式的朝贡贸易。

中日交往呈现多种形态，中国货物及人员输往日本，给日本社会带去诸多影响，概括而言体现三个方面：第一，物质流动，主要有陶瓷、香药、书籍、铜钱等；第二，人的流动，有商人、僧侣、使者；第三，思想的流动，主要包括信息、制度、规则、技术、技能、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语言等。然而，有别于内陆交往，中日交往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海上交通实现的，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海路的出入口便是宁波。人员及物质流动的载体是商人的船舶，同时伴随大批中国人去往日本，11-13 世纪间，在博多地区形成了“大唐街”。中国人生活在日本，也需要语言沟通，有些商人一边从事贸易活动，一边兼职作通事，甚至从事专职翻译，为文化交流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Guangzhi ^{1D} <https://orcid.org/0009-0008-8321-4050>

注解【Notes】

①这一提法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5 月 14 日，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提出的著名论断：“……宁波、泉州、广州、北海、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文），2017-05-14 11:52: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5/14/content_5193658.htm, [2026 年 1 月 31 日]。

②岸泽惟安著《典座教训讲话》：<https://junsoyo.on.coocan.jp/taberu/tenzo/tenzokyokun.htm>, [2026 年 2 月 13 日]。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比叡山專修院附属叡山学院編：《伝教大師全集》（第 1 卷）。比叡山図書刊行所，1927 年。

[Eizan Academy, Enryakuji Temple (Ed.), *Collected Works of Dengyō Daishi* (Vol. 1). Eizan Library Press, 1927.]

佛書刊行会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121 冊）。佛書刊行会，1915 年。

[Buddhist Texts Publication Society, *Complete Works of Japanese Buddhism* (Vol. 121). Buddhist Texts Publication Society, 1915.]

李广志：《文化摆渡者的双重诗镜——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唐诗接受与跨文化实践》，《文艺国际传播研究》1（2025），1-12。

[Li Guangzhi, “The Double Poetic Mirror of Cultural Ferryman: On Abe no Nakamaro’s Tang Poetry Reception and Cross-Cultural Practic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1(2025): 1–12.]

——：《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南开日本研究》，2015 年，139-152。

[---, “A Study of the Sea Route from Ningbo Used by Envoys to Tang Dynasty,” *Nankai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015,

139–152.]

——: 《日本遣唐使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 年。

[---, *A Study on the Envoys to Tang Dynast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25, 362.]

刘昉等撰: 《旧唐书》(简体字本二十四史, 第 32 册)。中华书局, 1999 年。

[Liu Xu et al., *Old Book of Tang* (Simplified Edition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Vol. 32).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奈良国立博物馆: 《圣地宁波》。奈良国立博物馆, 2009 年。

[Nara National Museum, *Sacred Ningbo*. Nara National Museum, 2009.]

森田悌訳: 《日本後紀(上)》。講談社, 2006 年。

[Morita Tsutomu (Trans.), *Nihon Kōki (Vol. 1)*. Kodansha, 2006.]

天童寺志编纂委员会编: 《新修天童寺志》。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年。

[Tian Tong Temple Gazetteer Compilation Committee, *Newly Revised Gazetteer of Tiantong Temple*.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1997.]

真人元开著, 汪向荣校注: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 1979 年。

[Oumino Mifune, *Record of the Great Tang Monk's Journey Eastward*, annotated by Wang Xiangr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中国方志丛书: 《牟平县志》(全三册)。成文出版社, 1968 年。

[Chinese Gazetteer Series, *Mouping County Gazetteer* (3 Vols.). Chengwen Publishing House, 1968.]

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Ennin, *A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Tang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